

doi: 10.19920/j.cnki.jmsc.2026.05.008

税收征管与公司税负水平的动态调整^①

王亮亮¹, 张海洋², 杨丹³

(1.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93; 2.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1189;
3.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 当偏离目标时公司会向其动态调整. 关于税负水平动态调整背后的决定机制犹如“黑箱”, 相关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 亟待学者们展开深入的研究. 纳税遵从涉及公司与税务机关的博弈, 而税务机关的征管无疑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 鉴于此, 文章利用 2003 年—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构建研究样本, 考察税收征管如何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 检验结果表明: 税收征管强度越高, 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越慢, 表明税收征管对公司税负水平的调整具有抑制作用. 多种稳健性检验下, 上述结论依旧保持不变. 进一步研究表明: 税收征管抑制公司税负调整速度的机制包括降低税负调整动机和提高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两方面; 税收征管对公司税负水平调整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相较于向上调整税负水平(提高至目标值), 税收征管对于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降低至目标值)的影响更为显著.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媒体关注较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明显. 本研究不仅发现了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因素, 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 而且从动态视角考察税务机关征管活动对公司税务管理行为的影响, 有助于全面揭示税收征管影响公司行为的逻辑和规律.

关键词: 税收征管; 目标税负水平; 调整速度

中图分类号: F275;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6)05-0124-17

0 引言

“有效税收筹划”(effective tax planning)的观点认为公司的税负目标并非税支最小化, 而是需要权衡税支和非税成本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公司存在最优(或目标)的税负水平^[1]. 理想情形下, 公司的税负会始终处于目标水平. 然而, 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原因在于公司税负水平的调整会面临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市场等形式的摩擦, 这都会阻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 使得它们偏离目标水平. Kim 等^[2]基于

实证数据验证了上述观点, 他们发现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 并且当偏离目标时会进行动态调整. 那么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仅有的少数几篇文献主要从公司特征、产品市场威胁以及产权性质等角度展开研究: Kim 等^[2]发现公司所属行业、当前税负水平与目标水平之间的大小关系、成长性、利润流动性以及是否为跨国公司等特征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Kim 和 Lee^[3]发现产品市场威胁也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原因在于产品市场威胁决定了公司的财务灵活性; 刘

① 收稿日期: 2023-03-02; 修订日期: 2024-06-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372025; 72442004; 721320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23YJA630112).

作者简介: 王亮亮(1986—), 男, 江苏泗阳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acwangll@126.com

行和赵弈超^[4]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更慢. 总体而言,关于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兴未艾,亟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入研究.

税收征管作为国家税收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保障国家税收目标的重要手段^[5,6].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税收征管会影响公司税收规避的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的税负水平,公司的税负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税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7-10]. 那么,税收征管是否会影响公司的税负调整决策,进而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呢? 中国在构建和完善现代税收征管体系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提升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税收征管的手段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税务机关会通过纳税人涉税指标的统计和分析,来识别公司的纳税风险. 《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国税发[2004]108号)中提到税务机关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申报资料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掌握纳税人的产品、原料、库存等生产经营基本状况和销售、成本、利润等财务情况,通过对纳税人当期涉税指标与历史指标的纵向比对、同行业纳税人涉税指标的横向比对,对疑点和异常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初步做出定性和定量判断,实现对纳税人的动态监控,做到“有的放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国税发[2008]88号)中也提到,税务机关会根据税负率、利润率、成本费用率等历史数据,识别税负异常、疑点较多的公司作为纳税评估重点对象. 由此可见,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过快使得公司的涉税指标(如税负率等)变化幅度较大时,更加容易引起税务机关的关注,面临税务稽查的风险,所以税收征管可能会降低公司的税负调整动机,进而影响到调整速度. 另外,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公司可用的税负调整手段和方式有所减少^[11],往往需要实施更为复杂和隐蔽的税负调整策略^[12],公司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变高,进而也可能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税收征管如何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已有研究仅考察了税收征管如何影响公司的税负水平^[9].

鉴于此,文章利用2003年—2019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构建研究样本,尝试考察税收征管如何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检验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强度越高,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越慢. 具体地,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约为94.0%,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约为83.0%,与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公司相比下降了11.7%. 在改变公司税负水平、税收征管强度的衡量方式以及使用替代性模型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上述结论依旧保持不变. 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征管会通过降低税负调整动机和提高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两条路径影响公司的税负调整速度;税收征管对公司税负水平调整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相较于向上调整税负水平(提高至目标值),税收征管对于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降低至目标值)的影响更显著.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在代理成本较高、媒体关注较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更明显.

主要的贡献包括以下两点: 1) 丰富了公司调整速度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自Kim等^[2]发现公司存在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的行为之后,除了Kim和Lee^[3]以及刘行和赵弈超^[4]较为直接地研究了公司调整速度的影响因素. 总的来说,关于公司调整速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本研究从税收征管视角出发,发现了公司税负调整速度的新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公司的税负调整行为,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此外,以往的研究大都基于公司税负水平的高低来反映公司的税务管理能力^[13,14],而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也是对公司税务管理能力的一种刻画,本研究也为理解和评价公司的税务管理能力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后续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2) 基于动态视角考察了税务机关的征管活动对公司税务管理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在考虑税收征管如何影响公司税务管理活动时,往往基于静态视角^[5,8,9],区别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基于动态视角研究了税收征管对公司税负调整速度的影响,拓展了税收征管影响公司税务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税收征管影响公司行为的逻辑和规律.

1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所得税占公司税前利润的 1/4 左右^②, 对于公司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费用支出^[15]. 降低税负不仅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入, 缓解融资压力^[16], 而且有助于建立竞争优势^[17], 提高公司价值^[18]. 那么公司的税负水平是否越低越好呢? Scholes 等^[19]认为公司在决定自身税负水平时, 需要权衡税收支出和非税收成本, 公司的税负水平并非越低越好, 理论上每一个公司都存在最优或目标税负水平. 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从侧面印证了公司可能存在目标税负水平, 如 Dyreng 等^[20]发现公司在不同年份的税负水平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税负水平的波动间接说明了公司可能存在目标税负水平; Armstrong 等^[21]在研究公司治理对税负水平的影响时发现, 董事会的财务经验越丰富、独立性越强, 即公司的治理水平越高, 越能够缓解公司处于极端税负水平(税负水平过低或过高)的情况, 这也从侧面暗示了目标税负水平的存在. Kim 等^[2]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 他们基于大样本数据发现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 并且指出现实中由于摩擦的存在, 公司无法始终处于目标税负水平.

如果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 那么当偏离目标时, 公司会向目标税负水平进行调整吗? 调整速度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已有的少数几篇文献主要从公司特征、产品市场威胁以及产权性质等角度展开研究: Kim 等^[2]发现公司会向目标税负水平进行调整, 并且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因公司的特征而异, 当公司的实际税负高于目标水平、公司成长性较低、利润流动性较高以及为跨国公司时, 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更快. 此外, 他们还发现不同行业的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也存在差异; Kim 和 Lee^[3]研究发现, 产品市场威胁也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刘行和赵弈超^[4]发现产权性质也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并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更慢. 总的来说, 关于公司向目标

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仍方兴未艾, 亟待学者们展开更多的研究.

类似于资本结构的调整^[22], Kim 等^[2]认为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取决于调整过程中遇到的摩擦的类型和大小. 税收征管作为国家税收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 是保障国家税收目标的重要手段.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纳税遵从是公司税务机关之间博弈的结果^[5, 6, 8-10, 23, 24], 纳税不仅仅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承担的后果, 税务机关也在公司纳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5]. 那么税收征管是否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呢? 如何影响呢? 文章认为税收征管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其一, 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 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动机下降, 进而使得其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变慢.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国税发[2004]108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国税发[2008]88号)所述, 在中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 税务机关会通过纳税人当期涉税指标与历史指标的纵向比对、与同行业纳税人涉税指标的横向比对, 实现对纳税人的动态监控. 当公司的某些涉税指标, 如有效税率等, 下降幅度过大时, 该公司被税务机关列为纳税评估重点对象的概率大大提高. 当然, 该指标上升幅度较大, 公司也可能被税务机关列为纳税评估重点对象, 因为这可能暗示公司之前的税负存在疑点. 总之, 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情形下, 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过快使得公司的涉税指标变化速度较快、幅度较大时, 更加容易引起税务机关的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 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有关资料, 不得拒绝、隐瞒”, 法律赋予了税务机关对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的权力, 当税务机关发现公司的纳税风险较大时, 可以通过现场检查等方式进一步核实公司的经营情况, 以判断公司是否存在违规情形. 鉴于公司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将产生巨

② 2008年1月1日起, 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 新税法下法定最高税率为25%, 占税前利润的比例为1/4.

大的成本^[13],所以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提高,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动机下降,进而使得调整速度变慢。

其二 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有所增加,进而使得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下降。一方面,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公司往往需要采用更为隐蔽、复杂的税负调整策略。公司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越高,公司常见的税负调整手段被发现的几率也越大^[5,9],公司为了成功调整自身的税负水平,必须采用更加具有经济实质,更加隐蔽、复杂的调整方式绕过税务机关的检查。例如,假设公司是企业集团的形式,其拥有很多子公司并且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税率差异,此时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业务结构的方式,如将更多的业务安排在税率较低(或较高)的子公司中,来实现税负水平的调整。显然,这种调整方式更加具有经济实质,被税务机关挑战的风险较低,然而,由于这样的调整方式更加复杂,并且每个公司可能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需要公司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谋划,甚至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与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公司相比,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公司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去设计和实施税负调整策略,使得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变高。另一方面,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漏洞会有所减少,对于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公司而言,其利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漏洞来调整税负水平的手段也有所减少^[11]。刘慧龙等^[12]以金税三期实施为背景,发现该系统上线后公司的关联交易显著减少,表明金税三期系统不仅可以帮助税务机关获取更多的信息,同时还提供了有效的数据处理以及分析的工具。可见,税收征管强度/能力的提升减少了公司可使用的税负调整方式和手段,进而使得公司实施税负调整活动的成本变高。总之,税收征管强度提高除了迫使公司采用更为隐蔽、复杂的税负调整策略以外,还会减少公司可利用的税负调整手段,因此,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公司实施税负调整活动的成本更高。而实施成本的提高一方面使得实施成本可能

超过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所获得的收益,降低了调整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实施成本的提高也意味着税负调整策略的实施难度有所提高,这都会使得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有所减慢。

综上,税收征管强度提高不仅会降低公司的税负调整动机,而且还提高了公司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据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1 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税收征管强度越高,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越慢。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研究设计借鉴 Kim 等^[2],采用部分调整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的做法如下。

第一,通过如下模型来衡量公司的目标税负水平

$$CETR_{i,t,t+2}^* = \beta X_{i,t-3,t-1} \quad (1)$$

其中 $CETR_{i,t,t+2}^*$ 为公司在 t 期~ $t+2$ 期的目标税负水平; β 为回归系数, $X_{i,t-3,t-1}$ 为一系列影响目标税负水平的变量,借鉴 Kim 等^[2],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以 $t-3$ 期~ $t-1$ 期平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③;市账率(MTB),以 $t-3$ 期~ $t-1$ 期的平均市值与对应期间平均股东权益的比值衡量;负债水平(LEV),以 $t-3$ 期~ $t-1$ 期的平均总负债与对应期间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衡量;资产回报率(ROA),以 $t-3$ 期~ $t-1$ 期的税前利润之和与对应期间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投资收益率($INVINC$),以 $t-3$ 期~ $t-1$ 期的投资收益之和与对应期间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衡量;资本密集度($CAPINT$),以 $t-3$ 期~ $t-1$ 期的平均固定资产与对应期间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衡量;存货密集度($INVINT$),以 $t-3$ 期~ $t-1$ 期的平均存货与对应期间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亏损强度($LOSS$),以 $t-4$ 期~ $t-1$ 期税前利润小于0的年份数量除以4衡量;现金有效税率的行业年度中位数($INDCETR$),以 $t-3$ 期~ $t-1$ 期实际

③ $t-3$ 期~ $t-1$ 期平均值的计算方式为 $t-3$ 期的期初值与 $t-1$ 期的期末值的平均值,其他资产负债表项目类似处理。

税负水平的分年度、分行业的中位数衡量;名义税率(*ATR*),以 $t-3$ 期~ $t-1$ 期母公司适用税率的均值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以 $t-3$ 期~ $t-1$ 期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 *GDP* 的均值衡量;地区产业结构(*SECOND*),以 $t-3$ 期~ $t-1$ 期公司所在省份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之和除以该省份对应期间的 *GDP* 之和衡量.除此以外,模型(1)中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以及年份固定效应(*YEAR*).

第二,在定义了目标税负水平以后,借鉴 Kim 等^[2],采用部分调整模型估计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标准的部分调整模型如下

$$CETR_{i,t,t+2} - CETR_{i,t-3,t-1} = \theta(CETR_{i,t,t+2}^* - CETR_{i,t-3,t-1}) + \varepsilon_{i,t,t+2} \quad (2)$$

其中 $CETR_{i,t,t+2}$ 为 t 期~ $t+2$ 期的实际税负水平,计算方式为 t 期~ $t+2$ 期实际所得税现金支出之和除以对应期间的税前利润之和,实际所得税现金支出=当期所得税费用+应交企业所得税期初值-应交企业所得税期末值; $CETR_{i,t-3,t-1}$ 为 $t-3$ 期~ $t-1$ 期的实际税负水平,计算方式与 $CETR_{i,t,t+2}$ 类似; $CETR_{i,t,t+2}^*$ 为 t 期~ $t+2$ 期的目标税负水平; θ 为 t 期~ $t+2$ 期公司税负水平的实际调整量占目标调整量的比例,也即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

将模型(1)代入模型(2)整理得

$$CETR_{i,t,t+2} = (\theta\beta) X_{i,t-3,t-1} + (1-\theta) \times CETR_{i,t-3,t-1} + \varepsilon_{i,t,t+2} \quad (3)$$

第三,为考察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借鉴姜付秀和黄继承^[26],对模型(3)进行如下拓展

$$CETR_{i,t,t+2} = (\theta\beta) X_{i,t-3,t-1} + (1-\theta) \times CETR_{i,t-3,t-1} + \gamma TE_{i,t} + \eta CETR_{i,t-3,t-1} \times TE_{i,t} + \varepsilon_{i,t,t+2} \quad (4)$$

其中 TE 为税收征管强度变量,借鉴曾亚敏和张俊生^[27]根据税收负担比率实际值与估计值的差值衡量,当差值大于其中位数时, TE 取 1,否则取 0, TE 取 1 时表明该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较高; $CETR_{i,t-3,t-1} \times TE$ 为 $t-3$ 期~ $t-1$ 期的实际税负水平变量($CETR_{i,t-3,t-1}$)与税收征管强度变量(TE)的交乘项.值得注意的是,模型(4)中,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可以表示为 $\theta - \eta \times TE_{i,t}$,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的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为 $\theta - \eta$,而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的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为 θ .若假设 1 成立,预期 η 显著为正.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型变量在 1% 和 99% 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

2.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文章利用中国资本市场 2003 年—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构建研究样本,区间选择理由如下:其一,起始年份设定为 2003 年,主要是为了避免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税收优惠政策^④以及分税制改革^⑤的影响;其二,结束年份设定为 2019 年,主要是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在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缺少过去四期和未来二期的数据^⑥、三年期($t-3$ 期~ $t-1$ 期与 t 期~ $t+2$ 期)的税前利润之和小于等于 0 的数据、三年期($t-3$ 期~ $t-1$ 期与 t 期~ $t+2$ 期)的实际税负水平为缺失值的数据、税收征管强度在三年期内(t 期~ $t+2$ 期)发生变更的数据及控制变量为缺失值的数据后,形成最终样本.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所用的公司实际税负水平数据系通过手工查阅年报中合并财务报表应交税费、所得税费用等附注部分的信息计算获得,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④ 2000 年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的通知》(财税[2000]99 号),该文件指出地方实行的对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允许保留到 2001 年 12 月 31 日,2002 年企业所得税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由于 2001 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果会影响 2002 年当期所得税费用,进而影响到 2002 年现金有效税率(*CETR*)的计算,因此以 2003 年作为起始年份.

⑤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1]37 号)以及《国务院关于明确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的通知》(国发[2003]26 号),自 2003 年开始,企业所得税中央-地方的分享比例稳定为 60:40,为了保证税收环境的稳定性,将样本起始年设定为 2003.

⑥ 变量计算涉及 $t-4$ ~ $t+2$ 期的数据,公司在 $t-4$ ~ $t+2$ 期连续七年存在数据才能产生一个观测值,故此剔除的样本量较大.

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Panel A报告了实际税负水平变量($t-3$ 期~ $t-1$ 期与 t 期~ $t+2$ 期)、税收征管强度变量以及目标税负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Panel B报告了用于估计目标税负水平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观察Panel A中的结果可知,第 t 期~第

$t+2$ 期实际税负水平($CETR_{i,(t,t+2)}$)的均值为0.258,标准差为0.275;第 $t-3$ 期~第 $t-1$ 期的实际税负水平($CETR_{i,(t-3,t-1)}$)的均值为0.230,标准差为0.214;可见,不同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税收征管强度(TE)的均值为0.588,中位数为1,反映出样本中约58.8%的公司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为实证检验提供了数据基础和可能性.目标税负水平($CETR_{i,(t,t+2)}^*$)的均值为0.258,与其中位数(0.257)较为接近.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5%分位数	中位数	95%分位数
Panel A: 实际税负水平、税收征管强度、目标税负水平						
$CETR_{i,(t,t+2)}$	9 542	0.258	0.275	0.055	0.196	0.602
$CETR_{i,(t-3,t-1)}$	9 542	0.230	0.214	0.036	0.184	0.522
TE	9 542	0.588	0.492	0.000	1.000	1.000
$CETR_{i,(t,t+2)}^*$	9 542	0.258	0.067	0.149	0.257	0.368
Panel B: 用于估计目标税负水平的变量						
$SIZE$	9 542	21.925	1.186	20.275	21.761	24.180
MTB	9 542	2.713	1.716	1.079	2.215	6.166
LEV	9 542	0.465	0.190	0.137	0.471	0.772
ROA	9 542	0.193	0.147	0.027	0.158	0.487
$INVINC$	9 542	0.026	0.050	-0.003	0.007	0.126
$CAPINT$	9 542	0.243	0.169	0.018	0.211	0.576
$INDCETR$	9 542	0.170	0.052	0.087	0.161	0.262
$LOSS$	9 542	0.037	0.104	0.000	0.000	0.250
$INVINT$	9 542	0.174	0.156	0.007	0.134	0.544
ATR	9 542	0.209	0.063	0.150	0.210	0.330
GDP	9 542	10.632	0.629	9.398	10.733	11.450
$SECOND$	9 542	0.460	0.086	0.235	0.484	0.557

3.2 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

表2报告了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影响的检验结果.列(1)~列(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公司 t 期~ $t+2$ 期的实际税负水平($CETR_{i,(t,t+2)}$).不过,各列的解释变量和样本有所差异:列(1)为模型(3)的检验结果,旨在考察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是否会向目标税负水平进行调整;列(2)为模型(4)的检验结果,用于考察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

响;列(3)为基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样本的检验结果,列(4)为基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样本的检验结果.

观察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知,列(1)中 $CETR_{i,(t-3,t-1)}$ 的系数为0.119,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会向其目标税负水平进行调整,且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约为88.1%(1-0.119)^⑦.列(2)中, $CETR_{i,(t-3,t-1)} \times TE$ 的系数为0.110,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征管会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

⑦ Kim等^[2]基于美国公司样本得到的调整速度约为69.2%,可见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更快.

水平的调整速度,并且税收征管强度越高,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越慢.假设1得到了验证.观察列(3)和列(4)中的检验结果也能够得到相同的结论.经济显著性方面,以列(2)的结果为例,发现与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

公司相比,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下降11.7%^⑧,在列(3)和列(4)中也能够得到类似结论,说明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还具有较强的经济显著性.

表2 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to target level of tax burden

变量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全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样本
	(1)	(2)	(3)	(4)
$CETR_{i,(t-3,t-1)}$	0.119*** (5.262)	0.060** (2.570)	0.169*** (4.794)	0.055** (2.192)
TE	—	-0.012 (-0.977)	—	—
$CETR_{i,(t-3,t-1)} \times TE$	—	0.110*** (2.761)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542	9 542	5 611	3 931
R^2	0.066	0.069	0.086	0.073

注: (1)*、**、***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2)括号内为依据稳健处理并在公司层面聚类标准误计算的t值.以下各表同.

4 稳健性检验

4.1 改变公司税负水平衡量方式的检验结果

前文在衡量公司税负水平时,使用三年期的公司实际所得税现金支出之和除以对应期间的税前利

润之和进行衡量.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还采用三年期的公司当期所得税费用之和除以对应期间的税前利润之和($ETR_{i,(t-3,t-1)}$ 、 $ETR_{i,(t,t+2)}$)作为替代性衡量方法重新进行检验.表3列(1)~列(3)中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改变公司税负水平衡量方式的情况下,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3 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方式的检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changing the measurement of key variables

变量	被解释变量: $ETR_{i,(t,t+2)}$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全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高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低样本	全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高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低样本
	(1)	(2)	(3)	(4)	(5)	(6)
$ETR_{i,(t-3,t-1)}$	0.125*** (5.283)	0.210*** (6.491)	0.109*** (4.555)	—	—	—
TE	-0.010 (-0.868)	—	—	—	—	—
$ETR_{i,(t-3,t-1)} \times TE$	0.082** (2.120)	—	—	—	—	—

⑧ 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为94.0%(1-0.060) 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为83.0%(1-(0.060+0.110)) 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下降了11.7%((83.0%~94.0%)/94.0%)。

续表 3
Table 3 Continues

变量	被解释变量: $ETR_{i,t,t+2}$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全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 较高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 较低样本	全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 较高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 较低样本
	(1)	(2)	(3)	(4)	(5)	(6)
$CETR_{i,t-3,t-1}$	—	—	—	0.059** (2.521)	0.170*** (4.836)	0.054** (2.160)
TE_2	—	—	—	-0.013 (-1.073)	—	—
$CETR_{i,t-3,t-1} \times TE_2$	—	—	—	0.112*** (2.812)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542	5 611	3 931	9 542	5 639	3 903
R^2	0.093	0.107	0.107	0.069	0.086	0.073

4.2 改变税收征管强度衡量方式的检验结果

前文在衡量税收征管强度时,根据税收负担比率实际值与估计值的差值设置税收征管强度变量。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文章还根据二者之间的比值设置税收征管强度变量(TE_2):当二者之间的比值大于其中位数时,税收征管强度变量取 1,否则取 0。观察表 3 列(4)~列(6)中的检验结果可知,在改变税收征管强度衡量方式的情况下,研究结论同样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4.3 使用替代性模型的检验结果

为排除前文得到的结论是税收征管对目标税负水平的直接影响所造成的,借鉴 Faulkender 等^[22],文章还采用两阶段方法进行估计。具体过程如下,第一,在模型(1)中额外控制税收征管强度变量;第二,通过估计模型(3)得到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⑨;第三,将估计模型(3)得到的回归系数代入到模型(1)中,得到目标税负水平,并将目标税负水平代入到模型(2)中估计调整速度;第四,为考察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参考 Faulkender 等^[22],对模型(2)进行如下拓展

$$CETR_{i,t,t+2} - CETR_{i,t-3,t-1} = (\theta_0 + \theta_1 TE_{i,t}) \times (CETR_{i,t,t+2}^* - CETR_{i,t-3,t-1}) + \varepsilon_{i,t,t+2} \quad (5)$$

为了方便结果展示,将模型(5)进一步简化为模型(6)

$$\Delta CETR_{i,t,t+2} = (\theta_0 + \theta_1 TE_{i,t}) DEV_{i,t,t+2} + \varepsilon_{i,t,t+2} \quad (6)$$

其中 $\Delta CETR = CETR_{i,t,t+2} - CETR_{i,t-3,t-1}$,为 $t-3$ 期~ $t-1$ 期至 t 期~ $t+2$ 期实际税负水平的变化量; $DEV = CETR_{i,t,t+2}^* - CETR_{i,t-3,t-1}$,为 $t-3$ 期~ $t-1$ 期实际税负水平与 t 期~ $t+2$ 期目标税负水平的偏离程度。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可以表示为 $\theta_0 + \theta_1 \times TE$,若假设 1 成立,预期 θ_1 显著为负。表 4 中的结果表明,在使用替代性模型进行检验的情况下,前文的研究结论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5 进一步研究

该部分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参考江艇^[28]的方法,从税负调整动机及税负调整活动实施成本两个角度进一步考察税收征管影响公司税负调整速度的机制;其二,考察税收征管对公司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即税收征管对税负水平向上调整(提高至目标值)和向下调整(降低至目标值)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⑨ 使用模型(1)进行估计的前提是:公司的税负水平调整决策是完美的,观测到的税负水平总是等于目标税负水平。实际上,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公司仅能部分地趋向目标税负水平,因此这里采用了同时估计目标税负水平和调整速度的方法(即通过模型(3))。

表 4 使用替代性模型的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using alternative models

变量	被解释变量: $\Delta CETR_{i,(t,t+2)}$		
	全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样本	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样本
	(1)	(2)	(3)
<i>DEV</i>	0.933 *** (40.397)	0.838 *** (27.167)	0.933 *** (40.394)
<i>TE</i> × <i>DEV</i>	-0.095 ** (-2.470)	—	—
<i>N</i>	9 542	5 611	3 931
<i>R</i> ²	0.325	0.282	0.383

5.1 税收征管影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机制检验

5.1.1 基于税负调整动机视角

理论分析部分指出,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提高,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动机下降,进而使得调整速度变慢.如果该分析成立,可以合理预期,当公司税负调整动机越容易下降时,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越明显.税务机关为了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在工作过程中往往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工作重心往往集中在规模较大的“重点税源”公司上,这些公司往往为当地政府“贡献”大部分税收收入^[29,30].因此规模较大的“重点税源”公司更容易受到税务机关的关注,其税负调整动机更容易受到影响,预期公司规模越大,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越明显.为验证该预期,构建如下模型

$$CETR_{i,(t,t+2)} = (\theta\beta) X_{i,(t-3,t-1)} + (1 - \theta) \times CETR_{i,(t-3,t-1)} + \alpha_1 TE_{i,t} + \alpha_2 TAAM_{i,(t-3,t-1)} + \alpha_3 CETR_{i,(t-3,t-1)} \times TE_{i,t} + \alpha_4 CETR_{i,(t-3,t-1)} \times TAAM_{i,(t-3,t-1)} + \alpha_5 TE_{i,t} \times TAAM_{i,(t-3,t-1)} + \alpha_6 CETR_{i,(t-3,t-1)} \times TE_{i,t} \times TAAM_{i,(t-3,t-1)} + \varepsilon_{i,(t,t+2)} \quad (7)$$

其中 *TAAM* 为税负调整动机变量,使用 *t* - 3 期 ~ *t* - 1 期经省份行业调整的营业收入的平均值衡量,该值越大,公司的税负调整动机越容易受到影响.如果上述预期成立,预期 α_6 应显著为正.表 5 中列 (1) 的结果显示, $CETR_{i,(t-3,t-1)} \times TE \times TAAM$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上述结果从侧面表明,税收征管会通过削弱税负调整动机降低公司的税负调整速度.

表 5 进一步研究: 基于税负调整动机和税负调整活动实施成本的检验结果

Table 5 Further research: Test results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of tax adjustment and the cost of implementing tax adjustment activities

变量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税负调整动机	税负调整活动实施成本
	(1)	(2)
	<i>PV</i> = <i>TAAM</i>	<i>PV</i> = <i>HT</i>
$CETR_{i,(t-3,t-1)}$	0.067 *** (2.668)	0.057 ** (2.282)
<i>TE</i>	-0.008 (-0.661)	-0.017 (-1.269)
$CETR_{i,(t-3,t-1)} \times TE$	0.072 * (1.787)	0.134 *** (3.077)
<i>PV</i>	0.001 (0.954)	-0.012 (-0.694)
$CETR_{i,(t-3,t-1)} \times PV$	-0.001 (-0.901)	0.038 (0.583)

续表 5
Table 5 Continues

变量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税负调整动机	税负调整活动实施成本
	(1)	(2)
	$PV = TAAM$	$PV = HT$
$TE \times PV$	-0.001 (-0.801)	0.028 (1.188)
$CETR_{i,t-3,t-1} \times TE \times PV$	0.014** (1.982)	-0.190** (-2.3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9 529	9 542
R^2	0.073	0.069

5.1.2 基于税负调整活动实施成本视角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税收征管影响调整速度的另一个原因是: 伴随着税收征管强度提高, 公司实施税负调整活动的成本有所增加, 进而使得调整速度下降. 若上述分析成立, 可以合理预期, 当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受到的影响更大时, 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应该更加明显. 由于无形资产的公平交易价格往往较难判断, 学者们发现公司可以操纵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来调整税负水平^[31-33]. 又由于高科技公司是国家创新活动的“领头羊”^[34-36] 在创新研发领域承担着“攻坚克难”的重要角色, 与非高科技公司相比, 高科技公司往往拥有大量的专利、特许权等无形资产. 因此, 高科技公司在调整税负水平时拥有更多的灵活性, 进而受到税收征管的影响相对较小, 预期税收征管对于非高科技公司的调整速度的影响更明显. 为验证该预期, 构建如下模型

$$\begin{aligned}
 CETR_{i,t,t+2} = & (\theta\beta) X_{i,t-3,t-1} + (1 - \theta) \times \\
 & CETR_{i,t-3,t-1} + \alpha_1 TE_{i,t} + \\
 & \alpha_2 HT_{i,t-3,t-1} + \alpha_3 CETR_{i,t-3,t-1} \times \\
 & TE_{i,t} + \alpha_4 CETR_{i,t-3,t-1} \times HT_{i,t-3,t-1} + \\
 & \alpha_5 TE_{i,t} \times HT_{i,t-3,t-1} + \alpha_6 CETR_{i,t-3,t-1} \times \\
 & TE_{i,t} \times HT_{i,t-3,t-1} + \varepsilon_{i,t,t+2} \quad (8)
 \end{aligned}$$

其中 HT 为标识公司是否为高科技公司的变量, 参考 Law 等^[37] 的研究, 若 $t-3$ 期 ~ $t-1$ 期公司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比值的均值超过 5%, 则为高科技公司, HT 取 1, 否则取 0. 如果上述预期成立, 则 α_6 应显著为负. 表 5 中列 (2) 的结果显示,

$CETR_{i,t-3,t-1} \times TE \times HT$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与高科技公司相比, 税收征管对非高科技公司的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上述结果从侧面表明税收征管会增加公司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 进而降低其税负调整速度.

5.2 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非对称影响

Kim 等^[2] 发现与向上调整税负水平(提高至目标值)相比, 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降低至目标值)的速度更快. 那么中国上市公司税负水平动态调整是否也存在这种非对称性呢? 更重要的是, 税收征管对公司税负水平的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 中国税收征管实践的一大特点是依据计划征税^[38], 每年上级政府会向下级政府下达税收任务, 下级政府收到税收任务之后再层层分解给下属部门, 为保障税收任务的完成, 各级政府向下分解税收任务的过程中会层层提高标准^[39], 导致下级税收部门面临极大的财政创收压力, 使得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更加关注有可能减少其税收收入的公司行为. 王百强等^[25] 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纳税支出粘性现象, 即公司利润减少时纳税支出的减少量小于利润等额增加时纳税支出的增加量. 与向上调整税负水平相比, 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将减少税务机关的收入, 显然会受到税务机关更多的关注, 因此预期税收征管对于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的影响更明显. 当公司的实际税负

水平大于目标税负水平时,即公司需要向下调整时,调整方向变量(ATL)取1,否则取0.表6中列(1)的结果显示, $CETR_{i,t-3,t-1} \times ATL$ 的系数为 -0.275,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公司税负水平的向上调整相比,其向下调整的速度更快,

与 Kim 等^[2]的发现相同.列(2)的结果显示, $CE-TR_{i,t-3,t-1} \times ATL \times TE$ 的系数为 0.217,并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相较于向上调整税负水平,税收征管对于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表 6 进一步研究: 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水平调整速度的非对称影响的检验结果

Table 6 Further research: Test results of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to target level of tax burden

变量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1)	(2)
$CETR_{i,t-3,t-1}$	0.305*** (4.834)	0.354*** (4.078)
$CETR_{i,t-3,t-1} \times ATL$	-0.275*** (-4.121)	-0.394*** (-4.522)
ATL	0.100*** (7.139)	0.123*** (6.619)
TE	—	0.018 (0.958)
$CETR_{i,t-3,t-1} \times TE$	—	-0.083 (-0.811)
$ATL \times TE$	—	-0.044* (-1.663)
$CETR_{i,t-3,t-1} \times ATL \times TE$	—	0.217* (1.9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9 542	9 542
R ²	0.073	0.075

6 异质性分析

6.1 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高效的税务管理活动被看作是经理层管理效率的象征^[40],这意味着代理成本较低的公司税务管理方面往往更为出色,能够更好地扮演公司“管家”的角色.经理层对于税务管理活动的认识或理解不同,面对税收征管环境的应对效果也存在差异.尽职、出色的管理者不光对公司所处的运营环境掌握更深,而且对于税务管理活动的理解也更深刻,这都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结合公司业务和税务的决策,从容应对税收征管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公司的税负水平.因此,预期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低的公司中会被

削弱.代理成本通过 $t-3$ 期 ~ $t-1$ 期自由现金流量衡量(FCF),借鉴魏志华和夏太彪^[41],具体有两种方式:其一,自由现金流量 = 经营现金流量 - 维持性投资 - 预期投资,其中,经营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期初总资产,维持性投资 = (固定资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期初总资产,预期投资参考了 Richardson^[42]的方法进行估计;其二,将上述计算过程中的期初总资产替换为营业收入.表7中列(1)的结果显示, $CETR_{i,t-3,t-1} \times TE \times FCF_1$ 的系数为 1.242,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列(2)中 $CE-TR_{i,t-3,t-1} \times TE \times FCF_2$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也能够得到类似的结论.

表 7 税收征管对公司调整速度的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7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of the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adjustment speed

变量	被解释变量: $CETR_{i,t,t+2}$				
	代理成本		媒体关注度		产品市场竞争
	(1)	(2)	(3)	(4)	(5)
	$MV = FCF_1$	$MV = FCF_2$	$MV = MEDIA_1$	$MV = MEDIA_2$	$MV = RENT$
$CETR_{i,t,t-3,t-1}$	0.067** (2.409)	0.058** (2.205)	0.269** (2.028)	0.209** (2.013)	0.062** (2.020)
TE	-0.023 (-1.528)	-0.017 (-1.184)	0.078* (1.748)	0.074* (1.761)	-0.030* (-1.689)
$CETR_{i,t,t-3,t-1} \times TE$	0.168*** (2.736)	0.145*** (2.808)	-0.186 (-1.075)	-0.185 (-1.286)	0.129** (2.403)
MV	-0.083 (-0.688)	0.019 (0.371)	0.015** (2.288)	0.016** (2.229)	-0.622** (-2.206)
$CETR_{i,t,t-3,t-1} \times MV$	-0.284 (-0.996)	-0.295** (-2.047)	-0.037* (-1.676)	-0.027 (-1.526)	1.079 (1.296)
$TE \times MV$	-0.299 (-1.601)	-0.126* (-1.845)	-0.017** (-2.056)	-0.017** (-2.133)	-0.174 (-0.730)
$CETR_{i,t,t-3,t-1} \times TE \times MV$	1.242* (1.730)	0.539** (2.294)	0.054* (1.652)	0.058** (2.049)	1.958* (1.8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 711	8 008	9 129	9 129	7 344
R^2	0.075	0.073	0.069	0.069	0.079

6.2 基于媒体关注的分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以往相比,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3-45].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媒体可以通过报道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对于公司不当行为的关注,从而放大公司的违规成本,约束公司的行为.如 Dyck 等^[46]在研究媒体关注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时发现,公司受到的媒体关注度越高,其纠正违规行为的概率越高.由于受到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往往面临更高的违规成本,所以相比之下,税收征管更容易约束这部分公司的行为.据此可以推断,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借鉴王西子和吴联生^[47],媒体关注度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衡量:其一 $t-3$ 期 $\sim t-1$ 期标题出现该公司的新闻总数 ($MEDIA_1$);其二 $t-3$ 期 $\sim t-1$ 期该公司的正面新闻总数 ($MEDIA_2$).观察表 7 可知,列 (3) 中 $CETR_{i,t,t-3,t-1} \times TE \times MEDIA_1$ 的系数为 0.054,并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

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媒体关注较多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列 (4) 中 $CETR_{i,t,t-3,t-1} \times TE \times MEDIA_2$ 的系数为 0.058,并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

6.3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

公司的行为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48],市场竞争程度不同,公司的行为也会有所差异.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公司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大:一方面,为了避免破产清算,管理层可能更加致力于改善公司各方面的管理效率,提高公司的竞争力^[49,50];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意味着市场资源紧缺,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下降,这使得管理者实现股东预期目标的难度增加,为了避免被解雇,管理层更可能会采取冒险行为.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无论是促使管理层更加勤勉尽责还是更容易冒险,税收征管环境的影响均会被削弱,因此预期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借鉴尹律等^[51],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RENT$) 的衡量方式如下: [息税

前利润 + 折旧额 + 摊销额 - (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 + 通货膨胀率) × (长期负债 + 股东权益)] / 总资产。需要说明的是,该变量同样取 $t-3$ 期 ~ $t-1$ 期的平均值。 $RENT$ 越大,公司可获取的“垄断租金”越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表 7 中列(5)的结果显示, $CETR_{i,t-3,t-1} \times TE \times RENT$ 的系数为正(1.958),并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在面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明显。

7 结束语

权衡观点认为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19]。Kim 等^[2]基于大样本数据开展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在此之后,关于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始起步。已有的少数几篇文献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产品市场威胁以及产权性质等方面^[2-4]。文章利用 2003 年—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构建研究样本,尝试考察税收征管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强度越高,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越慢。具体地,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约为 94.0%;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的调整速度约为 83.0%;相比较而言,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下降了 11.7%。在改变公司税负水平、税收征管强度的衡量方式以及使用替代性模型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下,上述结论依旧保持不变。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征管会通过降低税负调整动机和提高税负调整活动的实施成本两条路径影响公司的税负调整速度;税收征管对税负水平调整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相较于向上调整税负水平(提高至目标值),税收征管对于公司向下调整税负水平(降低至目标值)的影响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在代理成本较高、媒体关注较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明显。

文章的结论对于公司的税务管理和税务当局的征管实践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 公司不仅要在经营决策的“目标函数”中纳入税收因素,在源头上减少与目标税负水平的偏离幅度,而且还应清晰认识到税收征管对税负调整的影响,努力提高税负调整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公司进行经营决策时应将税收因素纳入考虑,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应尽量多方面、多角度地搜集相关信息,谨慎判断和考察经营决策的税收后果和税收经济性,在源头上减少“被动”的税负水平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文章发现当公司偏离目标税负水平时,税收征管作为一种摩擦会阻碍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公司管理层应清楚意识到税收征管对税负调整的影响,并基于此制定科学、合理的税负调整决策,尤其在公司需要向下调整税负水平时。如此一来,公司即便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情况下,也无需担忧税务机关的纳税调整以及稽查、处罚成本等,进而使得公司可以更快地向目标税负水平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2) 税务机关要合理加强税收征管,保障国家的税收目标。近年来,减税降费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一。2021 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约 1.1 万亿元^⑩。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公司的税收负担,激发了公司活力,然而政策的实施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高,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减税降费政策要在保障税收目标的前提下进行,而如何平衡其与财政压力的关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难题。前文发现,整体而言,税收征管会约束公司向向下调整税负水平的行为,表明税收征管强度越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越能够得到保证,既然如此,应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不过,正如李艳等^[52]提出,加强税收征管,并不等同于增加公司的税收负担,而是应当通过降低不法逃税来营造税负公平环境,为减税降费政策创造空间。由此可见,税务机关要合理加强税收征管,保障国家的税收收入,为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做好强有力的后盾。

⑩ 参见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172478/content.html>。

参考文献:

- [1]Scholes M , Wolfson M , Erickson M , et al. Taxes and Business Strategy: A Planning Approach[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2.
- [2]Kim J , McGuire T S , Savoy S , et al. How quickly do firms adjust to optimal levels of tax avoidance?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9 ,36(3) : 1824 - 1860.
- [3]Kim T , Lee P. Product market threats and tax avoida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3 ,86(Suppl C) : 102528.
- [4]刘 行 ,赵弈超. 企业税负的动态调整: 产权视角的研究[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3 ,37(1) : 47 - 64.
Liu Hang , Zhao Yichao. Dynamic adjustment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A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J].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Research ,2023 ,37(1) : 47 - 64. (in Chinese)
- [5]Beuselinck C , Deloof M , Vanstraelen A. Cross-jurisdictional income shifting and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public versus private multinational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5 ,20(2) : 710 - 746.
- [6]Dwenger N , Treber L. Shaming for tax enforcement[J]. Management Science ,2022 ,68(11) : 8202 - 8233.
- [7]孙雪娇 ,翟淑萍 ,于 苏. 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 (3) : 81 - 99.
Sun Xuejiao , Zhai Shuping , Yu Su. Can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ease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disclosure[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9 , (3) : 81 - 99. (in Chinese)
- [8]范子英 ,赵仁杰. 财政职权、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J]. 经济研究 ,2020 ,55(4) : 101 - 117.
Fan Ziyang , Zhao Renjie. Fiscal responsibilities , tax efforts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 2020 ,55(4) : 101 - 117. (in Chinese)
- [9]蔡伟贤 ,李炳财. 税收征管、税收压力与企业社保遵从[J]. 世界经济 ,2021 ,44(12) : 201 - 224.
Cai Weixian , Li Bingcai. Tax enforcement , tax pressure and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compliance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1 ,44(12) : 201 - 224. (in Chinese)
- [10]王亮亮. 公司避税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吗?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1 ,35(5) : 3 - 24.
Wang Liangliang. Doe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decreas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apital market [J].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Research ,2021 ,35(5) : 3 - 24. (in Chinese)
- [11]曾 姝 ,李青原. 税收激进行为的外溢效应——来自共同审计师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6 , (6) : 70 - 76.
Zeng Shu , Li Qingyuan. Spillover effect of tax aggressiveness: Evidence from common auditor in China [J].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 (6) : 70 - 76. (in Chinese)
- [12]刘慧龙 ,张玲玲 ,谢 婧.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关联交易治理[J]. 管理世界 ,2022 ,38(6) : 158 - 176.
Liu Huilong , Zhang Lingling , Xie Jing. Tax enforcement digitiz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rporat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J].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6) : 158 - 176. (in Chinese)
- [13]赵纯祥 ,张敦力 ,杨 快 ,等. 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降低企业税负吗? [J]. 会计研究 ,2019 , (11) : 70 - 77.
Zhao Chunxiang , Zhang Dunli , Yang Yang , et al. Can independent directors with experience of tax enforcement reduce enterprise tax burden? [J]. Accounting Research ,2019 , (11) : 70 - 77. (in Chinese)
- [14]李吉园 ,邓英雯 ,张 敏. 本地 CEO 与企业避税: 家乡认同还是寻租? [J]. 会计研究 ,2020 , (7) : 119 - 130.
Li Jiyuan , Deng Yingwen , Zhang Min. Local CEO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Home identity or rent-seeking? [J].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 (7) : 119 - 130. (in Chinese)
- [15]王亮亮 ,施 超 ,阮 语 ,等. 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与实际税负[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 (6) : 156 - 173.
Wang Liangliang , Shi Chao , Ruan Yu , et al. Allocation of decision rights in business groups and actual tax burden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3 , (6) : 156 - 173. (in Chinese)
- [16]陈作华 ,方红星.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J]. 管理科学 ,2018 ,31(3) : 125 - 139.

- Chen Zuohua , Fang Hongx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 2018 , 31(3) : 125 - 139. (in Chinese)
- [17]刘 行,吕长江. 企业避税的战略效应——基于避税对企业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J]. *金融研究* , 2018 , (7) : 158 - 173.
- Liu Hang , Lü Changjiang. Strategic effect of tax avoidance: The causal impact of tax avoidance on firms' product market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 2018 , (7) : 158 - 173. (in Chinese)
- [18]Graham J R , Tucker A L. Tax shelters and corporate debt polic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2005 , 81(3) : 563 - 594.
- [19]Scholes M S , Wilson G P , Wolfson M A. Tax planning , regulatory capital planning ,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strategy for commercial bank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1990 , 3(4) : 625 - 650.
- [20]Dyreg S D , Hanlon M , Maydew E L. 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Accounting Review* , 2008 , 83(1) : 61 - 82.
- [21]Armstrong C S , Blouin J L , Jagolinzer A D , 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 incentives , and tax avoida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2015 , 60(1) : 1 - 17.
- [22]Faulkender M , Flannery M J , Hankins K W , et al. Cash flows and leverage adjustment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2012 , 103(3) : 632 - 646.
- [23]Lin K Z , Mills L F , Zhang F , et al.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aken tax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 2018 , 35(4) : 1941 - 1972.
- [24]王亮亮. 研发支出资本化或费用化: 税收视角的解释[J]. *会计研究* , 2016 , (9) : 17 - 24.
- Wang Liangliang. Capitalization or expensing of R&D expenditures: A tax perspective explanation [J]. *Accounting Research* , 2016 , (9) : 17 - 24. (in Chinese)
- [25]王百强,孙昌玲,伍利娜,等. 企业纳税支出粘性研究: 基于政府税收征管的视角[J]. *会计研究* , 2018 , (5) : 28 - 35.
- Wang Baiqiang , Sun Changling , Wu Lina , et al. Tax expense stickines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collection of governments [J]. *Accounting Research* , 2018 , (5) : 28 - 35. (in Chinese)
- [26]姜付秀,黄继承. 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 *管理世界* , 2011 , (3) : 124 - 134.
- Jiang Fuxiu , Huang Jicheng.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capital structure [J]. *Management World* , 2011 , (3) : 124 - 134. (in Chinese)
- [27]曾亚敏,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 [J]. *管理世界* , 2009 , (3) : 143 - 151.
- Zeng Yamin , Zhang Junsheng. Can tax enforcement play a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J]. *Management World* , 2009 , (3) : 143 - 151. (in Chinese)
- [28]江 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 2022 , (5) : 100 - 120.
- Jiang Ting.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 2022 , (5) : 100 - 120. (in Chinese)
- [29]Zimmerman J L. Taxes and firm siz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1983 , 5(1) : 119 - 149.
- [30]于文超,殷 华,梁平汉. 税收征管、财政压力与企业融资约束[J]. *中国工业经济* , 2018 , (1) : 100 - 118.
- Yu Wenchao , Yin Hua , Liang Pinghan. Tax enforcement activities , fiscal pressure and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s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 2018 , (1) : 100 - 118. (in Chinese)
- [31]Markle K S , Mills L F , Williams B. Implicit corporate taxes and income shifting [J]. *Accounting Review* , 2020 , 95(3) : 315 - 342.
- [32]McGuire S T , Rane S G , Weaver C D. Cost structure and tax-motivated income shifting [J]. *Accounting Review* , 2023 , 98(7) : 435 - 456.
- [33]De Simone L , Klassen K J , Seidman J K. The effect of income-shifting aggressivenes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2022 , 74(1) : 101491.
- [34]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 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J]. *经济研究* , 2020 , 55(6) : 105 - 121.

- Liu Shiyuan, Lin Zhifan, Leng Zhipeng. Whether tax incentives stimulate corporate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orporate life cycle theory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55(6): 105–121. (in Chinese)
- [35] 李思飞, 李鑫, 王赛, 等.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数字化转型: 激励还是抑制? [J]. *管理世界*, 2023, 39(6): 171–191.
- Li Sifei, Li Xin, Wang Sai, et al. Family firm success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J]. *Management World*, 2023, 39(6): 171–191. (in Chinese)
- [36] 彭涛, 黄福广, 孙凌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 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3): 98–114.
- Peng Tao, Huang Fuguang, Sun Lingxia.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venture capital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3): 98–114. (in Chinese)
- [37] Law K M, Lau A K, Ip W H. What drives success in product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in high-tech and low-tech manufacturers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9, 79(2): 165–198.
- [38] 吕冰洋, 郭庆旺.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 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2): 76–90.
- Lü Bingyang, Guo Qingwang. Why China's tax revenue is likely to maintain its rapid growth: An explan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ax capacity and tax effort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 (2): 76–90. (in Chinese)
- [39] 周黎安, 吴敏. 省以下多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 特征事实与解释 [J]. *金融研究*, 2015, (10): 64–80.
- Zhou Li'an, Wu Min. Tax sharing rates among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China: Facts and explan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5, (10): 64–80. (in Chinese)
- [40] Koester A, Shevlin T, Wangerin D. The role of managerial ability i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63(10): 3285–3310.
- [41] 魏志华, 夏太彪. 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财务压力与企业避税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7): 136–154.
- Wei Zhihua, Xia Taibiao.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burden, financial pressur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0, (7): 136–154. (in Chinese)
- [42]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3): 159–189.
- [43] 逯东, 宋昕倍. 媒体报道、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与融资约束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12): 45–61.
- Lu Dong, Song Xinbei. Media coverage, readabi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annual reports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12): 45–61. (in Chinese)
- [44] Harris E E, Neely D G, Saxton G D. Social media, signaling, and donations: Testing the financial returns on nonprofits' social media investment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3, 28(2): 658–688.
- [45] Xu G, Feng X, Li Y, et al. Mediation effects of online public atten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precautionary behavior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2, 7(1): 159–172.
- [46] Dyck A, Volchkova N, Zingales L.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Evidence from Russia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3): 1093–1135.
- [47] 王西子, 吴联生. 审计师收取客户债务风险溢价了吗? [J]. *审计研究*, 2020, (2): 57–66.
- Wang Xizi, Wu Liansheng. Does the auditor charge risk premium on the client's debt? [J]. *Auditing Research*, 2020, (2): 57–66. (in Chinese)
- [48] Huang Y, Jennings R, Yu Y.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anagerial disclosure of earnings forecasts: Evidence from import tariff rate reductions [J].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3): 185–207.
- [49] Kepler J D, Naiker V, Stewart C R. Stealth acquisitions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J]. *Journal of Finance*, 2023, 78(5): 2837–2900.
- [50] 王红建, 汤泰劼, 李茫茫, 等.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2): 28–47.
- Wang Hongjian, Tang Taijie, Li Mangmang, et al. Inflation, asymmetric devaluation risk and trade credit restructuring: Perspective from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the product marke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

(2): 28–47. (in Chinese)

[51] 尹 律, 徐光华, 易朝晖. 环境敏感性、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质量[J]. 会计研究, 2017, (2): 69–75.

Yin Lü, Xu Guanghua, Yi Zhaohui.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market competition in products, and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deficiencies disclosure[J].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2): 69–75. (in Chinese)

[52] 李 艳, 杨婉昕, 陈斌开. 税收征管、税负水平与税负公平[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1): 24–41.

Li Yan, Yang Wanxin, Chen Binkai. Tax enforcement, tax burden level and fairnes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0, (11): 24–41. (in Chinese)

Tax enforcement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WANG Liang-liang¹, ZHANG Hai-yang², YANG Dan³

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3.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trade-off theory implies that firms have target levels of tax burden and will adjust when the current levels of tax burden deviate from the target.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tax burden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and still remains a “black box”, requiring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Since tax compliance involves a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s and tax authorities, tax enforcement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the adjustment of firms towards their target tax burden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uses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3 to 2019 to construct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xamine the impa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speed at which firms adjust towards their target tax burden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ax enforcement, the slower the adjustment speed toward the target tax burdens, indicating that tax enforcement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firms’ tax burden adjustment. Under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s remain unchanged.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tax enforcement restrains the speed of tax burden adjustment through two channels: Reducing firms’ motivation for tax burden adjustment and increasing the costs of implementing tax adjustment activities. The impa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tax burden is asymmetric. Compared with upward adjustments of the tax burden level (increasing to the target value), the impa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downward adjustment of the tax burden level (reducing to the target value)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toward the target tax burden is more obvious in firms with higher agency costs, more media attention, and lower level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sheds light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peed at which firms adjust their tax burdens but also addresses the insuf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urthermore,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ax enforcement activities of the tax authorities on firms’ tax management behavior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tax enforcement affects firms’ behavior.

Key words: tax enforcement; target level of tax burden; adjustment speed